

中国大陆在美国居留人才现状

(为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引进创新性产品开发设计人才建言)

作者：骆南植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洛杉矶学院

中国海外留学生大体现状

综合中国某些网站文章所提供的信息，中国自1980年度至今出国留学生（包括公费与自费）人数大约在130万至160万之间（其中自费留学生大约占80%到90%）。比较可信的看法是，其中三分之一（大约在40万至50万之间）学成后回国（绝大多数学有专长，但所学专业偏重“理论性”或文科如商业管理等“软专业”，在美国因为本土人才过剩而难以发展）。另有三分之二（大约在90万至110万之间）留在海外。美国《侨报》2014年6月3日A3版发表陕西三原雷钟哲先生题为《惟愿海归逐梦来》的署名文章，指出“上世纪最后十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博士滞留海外的比例高达87%”。本人对这方面没有亲自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但是根据本人多年接触所得经验，可以有相当大的把握来做大胆的设想，留在海外的留学生相当一大部分为自费留学生，其中大约50%左右因为经济原因并没有完成学业，但是通过各种正当的方法（专业人才移民或结婚移民）、或不正当的方法（“政治庇护”等）取得居留外国的权利，在某些领域中，学到在西方国家谋生所需要的专业技能，但是并没有掌握能够帮助中国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所需要的中高端知识或实际工作经验。另外50%（大约在45万至55万之间）完成学业，其中大约50%没有找到同所学专业相适合的工作（即“用非所学”）。因此，“学有所用”者人数大概不会超过45万至55万。其中从事科学、技术、工程、产品设计、美工设计等有可能帮助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者人数，乐观地说来，大概在10万人以下。在这10万人当中，创新能力曾经在国际主流社会中得到承认（例如在国际设计竞赛中得奖等），曾经担任过两年制社区学院以上高等院校教授（**请注意，这里指的是一般大学，而不是“知名高校”**），曾经在跨国公司中担任过一般以上职务（**请注意，这里指的是一般职务，而不是“关键岗位”**），曾经编写过创新性大学教科书，完成过或者仅仅做过开拓性研究、提出过教育改革项目的人才，最乐观的估计不可能超过5万人（包括排在倒数第一名的本人在内）。这5万领军人才就海内外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大概属于中高层次。

早期自费留学生的特点：这部分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靠海外亲友名义上、或实际上赞助自费到海外留学，基本上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方面、或海外华人社会团体任何帮助或指导（不仅如此，甚至因为来自中国或者不会讲广东话，遭到华人社会中曾经颇有势力的亲台湾的反共抗中派别、以及有大广东方言霸权主义倾向的华人老板的歧视、排挤、和骚扰），大多数人因为经济困难，或者求学意志不坚定，只能靠打工为生，在学业上是失败

的。不仅自费留学生如此，中国大陆的教授到了美国也是这样，由于学术资格、英语水平等原因，改行做体力劳动者，从事其他华人族群不愿意做的低端职业，大有人在。美国《侨报》2014年8月24日B1版以《年过半百新移民开家庭养老院创业》为题报道浙江大学数学教授李越和化学工程教授南玲夫妇移民美国后为了生活，当保姆、做园丁、最后开设家庭养老院亲自照顾老人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少部分自费留学生全靠孤军奋斗、自行摸索，付出比其他族群多一倍到两倍的代价，白手起家，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一定成果，并加入外国国籍、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自费留学生中，绝大多数由于出国时基本上“身无分文”，受到有钱的台湾人（尤其是旅居海外的国民党外省人）或海外华人中亲台湾人士公开的歧视与排斥，如果遇到经济困难，只能从白人或犹太人宗教或慈善团体中获得少量帮助（偶然可能得到个别非国民党的华人团体或人士帮助，但是往往杯水车薪，数额少得不值一提）。因此，在他们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加上美国主流社会少量帮助奋斗成功后，对他们进行“民族主义”、“爱国爱乡”、“炎黄子孙、血溶于水”的宣传鼓动不仅难于奏效、甚至可能引起反感。他们基本上认同“世界公民”观念，而对于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处理同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关系中的许多不友善的做法、以及西方媒体中自由传播的许多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蒋介石的负面资讯，而对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非常反感）。他们的特点是理性务实（说穿了，就是比较坚定不移地实践他们在中国大陆、以及西方国家大专院校所开设的哲学课程中所包括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注重同个人的阶级地位有关的经济利益！），他们对抽象的政治宣传不感兴趣，但是由于自身的经历，基本上能够做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并且同中国政府与企业互利合作。早期留学生从中国带来的价值观念基本上受到《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毛泽东著作影响下产生的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类似于美国建国初期清教徒农业社会的特征，但是同资本主义大工业在美国大规模发展后形成的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有一定区别）。早期自费留学生大部分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稳健型精英人士，成长于毛泽东和华国锋时代，受到的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半军事化生活的熏陶，来到美国后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犯罪事件鲜有所闻，除了极少数同台湾当局有来往的、反共抗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民主运动人士”之外，绝大多数人士在政治上遵守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游戏规则”、谦虚谨慎、行事低调但是不卑不亢，对中国政治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中立立场，对于中国大陆某些认同台湾当局“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动不动非议中国政府、鼓吹在中国大陆实行激进的“政治改革”让“社会精英”、上台执政的“公共知识分子”嗤之以鼻。早期自费留学成功人士大多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定的现行国家执政体制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现实必要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遵守中国同美国建交公报所确立的不同台湾地方当局发展官方关系的原则。尽管如此，基于历史经历和现实利益，早期自费留学成功人士大多数人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改善海外华人工作，在尊重并维护现存国家执政体制的绝对稳定、尊重并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现实利益格局的基本稳定、尊重并维护国内各阶层人民大众基本生活福利保障的持续稳定、尊重并维护现

有国际体制的长期稳定、尊重并维护目前国际主流社会普遍接受的人际关系行为准则的相对稳定的“五项尊重并维护稳定的基本框架”下，温和渐进地改善和调整执政方法，更加有效地建设和谐社会，并且具备为中国政府提供技术层面上的建设性、创新性、非颠覆性的咨询意见的能力。但是这部分人士在美国主流社会生活多年，价值观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实质性变化，其中右派人士已经接受了美国共和党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希望中美两国政府进一步削减权力、减少社会福利、减少富人税收、让自由市场精英人士主导经济。左派已经扬弃了不适合美国国情的“文化大革命”版本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放弃了“阶级斗争”观念，告别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回归了大清康乾盛世的以阶级合作、民族融合为基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并且融入了美国民主党自由派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类似于英国工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治国方案），在政治上追求的是以“三高三保障”（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保障知识产权、保障劳资集体谈判权、保障学术自由）为核心的、让中下层劳动人民得到现实经济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希望中美两国政府进一步对市场经济加强宏观调控和微观规范，增加政府对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改善中下层劳动人民社会福利。这种基本上以现实经济利益的积极创造和合理分配为核心、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理念，既有别于前苏联要求工人阶级无代价地为了“打倒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勒紧裤带的、“唯我独革”、形“左”实右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实现“反共复国”的目标，让台湾工人阶级勒紧裤带、收入水平至今只能接近美国标准的一半的“三民主义”理念水火不相容，甚至至今为止，同某些打着“爱国爱乡”旗号在政治上形“左”实右、夸夸其谈而实际上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尤其是其中的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某些“亲大陆”团体的理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事实上，来自中国大陆的自费留学生中学术上成功人士绝大多数在为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大学、研究机构、公司工作，少部分自己开设服务性公司，其中极少数人士从事创新型产品设计。由于自身来美国留学早期同台湾国民党人接触过程中的不幸经历等历史原因，这部分人士同亲国民党的华人群体有著难于弥合的族群矛盾，为台湾、或来自台湾的美国华人企业工作的数量极少（除了政治与文化隔阂，亲国民党的华人企业在支付报酬方面大多低于美国主流社会企业，甚至低于来自新加坡、香港等前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华人企业，是更加现实的原因）。这部分由早期自费留学奋斗成才的人士掌握著对中国企业由为外国厂商加工零部件的“代工模式”转型为创立自己的品牌、同国际主流社会跨国企业先进实践直接接轨的“自主创新开发模式”所需要的国际视野、研发环境与实际技能，但是由于他们成才靠的完全是个人艰苦奋斗（他们吃过的苦是中国大陆人士所难于理解或想象的），在法律上或政治上要求他们毫无代价地、或者按照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普遍通行的低报酬与低待遇标准（按照实际购买力水平大概相当于美国主流社会五分之一），帮助中国国营或民营企业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近年来回到中国的海归人士，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难于在美国找到学有所用的工作而被迫回中国的。美国《侨报》2014年9月28日以《王起明回中国》为题报道来自中国大陆的精英学者的难处，指出因为“经济拮据，有的教授从来没进过理发馆”，“国内的人懵懵懂懂想来美国，回中国的人也不说实话。什么教授舍弃了洋房汽车、优厚待遇回到

了中国，全错！假的！”《侨报》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报纸，能够一针见血、实事求是地报道有关“海归”问题的真相，说明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在消除 1911 年发生的资产阶级暴力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后，“民国”战乱时期中国恶霸地主和奸商资产阶级政客慷慨激昂而不切实际、夸夸其谈而于事无补、造反起家而祸国殃民遗留下来的自吹自擂风气、王明为首的亲苏派主导中共苏区根据地时期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推行的“假、大、空”欺骗宣传的恶劣影响，恢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直至 1957 年“大跃进”以前实事求是、对人民说实话、按照现实条件制定科学合理的方针政策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侨报》的这篇文章，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吸引海外华人人才是有帮助的。根据我多年的观察，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学术精英在美国拥有洋房汽车、优厚待遇者大有人在，但是由于中国方面提供的报酬、待遇、科研条件同国际主流社会标准至今还没有完全接轨，以及近年来社会风气腐败、人际关系复杂化、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有问题，以及这部分人士历史上形成的同美国主流社会难以割舍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学术和专业精英至今选择为国际主流社会服务。这一现象非常正常，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原理；唯物主义原理千条万绪，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讲究现实的经济利益的积极创造与合理分配；违背了这一条根本的道理，单单靠“爱国爱乡”、“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宣传说教吸引人才回归，甚至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搞起“假大空”的不实宣传报道，只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自欺欺人，误国误民。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开明务实的政策，在尊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学术和专业精英的合理合法权益（包括社会荣誉、经济利益、合理范围内的特殊照顾等），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同国际主流社会接轨的基础上，在创新开发所产生的经济利润方面实行“劳资两利”合理分享的前提下，基于民族亲情、个人现实利益，让他们为中国的进步做贡献（包括提供少量的免费的咨询服务），是切实可行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目前推行的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北京市“海聚工程”、江苏省“双创计划”等，正在朝著这一正确方向进步。

近期自费留学生的特点：按照本人的观察，最近几年来遇到的中国留学生多数比较有钱，喜欢摆阔。其中极少数人实属纨绔子弟、留学垃圾、民族败类。就整体而言，他们比起早期自费留学生来说更加看中、甚至是极端看重个人眼前现实利益。近期留学生从中国带来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一切向钱看”的市侩式的极端的现实主义、和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美国《侨报》有一篇文章指出他们“吃苦精神不如前辈”，“他们够西化，注重隐私和个人空间”（网页：http://chinese.usqiaobao.com/2009-09/24/content_302582.htm）。根据本人的接触，这批人中许多人的极端利己主义倾向实在让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本土人士望尘莫及。美国本土人士尽管相信个人奋斗，但是也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中国大陆来的留学垃圾则是损人利己甚至不懂礼貌的（比如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喧哗，获得帮助后不

说一声谢谢，请人用电子邮箱联系却迟迟不给答复，如此等等）。近期自费留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富豪阶层子弟，其中花花公子不乏其人，他们喜欢吃喝玩乐，学业上不思进取，花钱雇人代做作业。有些人明明不缺钱花，却偏偏纠集一群同学在校园内摆摊子卖热狗，简直就跟中国明朝时期不务正业的“木匠皇帝”、美国越战期间“垮掉了的一代”毫无两样。近五年来美国社会中少数中国自费留学生炫耀财富、违法乱纪时有所闻。美国《侨报》2014年9月29日A3版报道多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恶性犯罪案件，包括男性留学生吴明杀害20岁女性留学生邵童并藏尸汽车后备箱，刘强驾车严重超速导致恶性撞车事故死伤四人被美国警方逮捕罚交200万美元保释金。除此之外，由于极少数富豪级留学生购置豪华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不懂得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游戏规则”，缺乏自知之明，高调张扬，在政治上忽左忽右，夸夸其谈，已经引起美国社会人民大众、尤其是底层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社区的不满，导致许多美国贫困人士枪杀富裕的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不时发生，如就读收费昂贵的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纪欣然2014年7月24日被抢劫并斗殴致死、吴颖（女）和瞿铭2014年4月11日被枪杀。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侨报》所报道的那样，“每次中国留学生丧命海外的事件爆出后，接踵而来的诸如‘有钱留美死了活该’类似的网络暴力讨伐更令每个在美的留学生心寒不已”。这说明部分中国富豪人士致富后没有回馈中国社会、不肯为中国教育事业捐献合理数额资金，却花费巨资送子女到美国昂贵私立学校“镀金”，为向海外转移财富铺路的做法在伦理上和法律上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中国大陆人民大众广泛质疑。更加严重的是，近期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犯罪事件已经引起美国社会严重关注。《侨报》电子版网页

<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4/0925/993292.shtml> 2014年9月5日报道说，密歇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人数激增，相应出现不少法律问题，出事的留学生大多前往大学附近最大的城市底特律寻找法律援助，该市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透露，该律师事务所每年接到50到100宗有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刑事案件，[...]案件从醉酒驾车、打架到偷盗等等，一些留学生没有法律观念，甚至希望通过中国人通用的“找关系”摆平案件。很多留学生甚至会问起“自己是中国人，美国的法律是否对我适合？”这样奇怪的问题。“一名19岁的中国留学生戴嘉艺（Jiayi Dai，音译）因饮酒过量于8月23日猝死在刚搬进的学生公寓中。今年6月19日该校中国留学生张新悦（Xinyue Zhang，音译）又因吸毒过量暴毙”。中国留学生涉及的毒品案件也相当严重。“有中国留学生在交通临检站被查出拥有大麻而被捕”。“密歇根州大中国留学生一个最严重案件是有关信用卡欺诈的案件，曾有一名中国留学生使用并非他本人的信用卡来购买电脑，结果刷卡时被发现，并被捕入狱”。“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大部分都很有钱，从他们开的车子就看出来，这些留学生还非常喜欢开车到处转、去购物等，因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但在当地发生案件，在其它地方也有案件。[...]曾有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路易威登店盗走了一个价值上千元的名牌包包而被捕”。“很多中国留学生男女朋友之间会发生矛盾甚至演变成暴力事件，让警方介入”。“一个中国留学生与女朋友打架，结果其女友摔倒需要接受手术，有很大一笔医疗开销，因为不能去学校上课还有其它开销，最后这名男生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这样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国际形象的情形，自从100多年前大清皇太后慈禧老佛爷和光绪皇帝推行新政改革开放时期向美国派遣首批留学生以来，是史无前例的。由于近期中国留学生中类似问题

的普遍存在，加上许多人花费巨资到海外“镀金”并没有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海归在中国社会的价值已经大大下降。《侨报》2014年9月27日B2版以《海归参加11次招聘会宅家一年仍待业啃老》为题报道，“不少海归现在依然宅在家靠父母生活。他们当中最短的宅家时间为3个月，最长的宅家时间为1年4个月。几乎所有宅家的海归都没有生活来源，依靠父母生活。对于这种现象，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认为，海归宅在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盲目出国，大量出国”。这一论断完全正确。事实上，我在美国所见过的不少近期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出国留学，纯属“父母之命、中介之言”的“包办婚姻”，目的在于“镀金”，甚至读了一年还没有确定专业。这种千奇百怪、令人惊愕不已的怪现象在早期自费留学生中是即使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学术腐败也是近期中国留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侨报》2014年7月3日A3版和2014年7月26日A12版引用美国教育部门主管官员访谈记录，和美国主流社会新闻媒体报道指出“申请来美高校一成中国学生造假”，“申请材料千篇一律，成绩单被动过手脚，实际水平严重不符”，“留学中介造假盛行”，“90%的中国申请者提交了捏造的推荐信，70%的个人自传是别人代写的，50%的人篡改了高中成绩，10%的人列出了从未得到的奖励和成绩”，“英语高分低能，学业全凭作弊、抄袭”，“中国留学生作弊屡被抓”。以上情形在早期自费留学生中是鲜有所闻的。当时的中国大陆人士经过“政治运动”多次“修理”，作奸犯科的胆子较小。近年来生活条件提高，政治自由增多，但是道德伦理教育质量下降，玩世不恭、胆大妄为、乱说乱动、随心所欲的刁民乱党心态扶摇直上，导致各种乱象层出不穷。中国台湾的情形十分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先生、蒋经国先生统治时期，虽然“白色恐怖”滥杀无辜、勾结前苏联企图反攻大陆、背叛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危害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军事格局的稳定与世界和平，罪孽深重、罄竹难书，但是对于台湾内部社会上传统伦理道德的维护十分重视，还参考毛泽东先生“延安整风”有益经验，严厉推行“国民党改造运动”，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台湾人民在文化认同方面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影响，回归中华文明（尽管某些高压手段如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会受到压制，属于矫枉过正的不当措施），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台湾人士当中，尽管“外省人”族群（即“国民党去台人员”）少数权贵人士仗势欺人，吃香喝辣，侵犯人权，劣迹斑斑，绝大多数台湾省本土族群人士无权无势，规规矩矩，站有站姿、坐有坐相、学有所长、行止得体。李登辉先生推行民主化改革后，平反二二八起义事件，平反冤假错案、开放海峡两岸自由来往固然值得赞赏，但是推行“反共抗中”和“台湾独立”路线、为日本殖民统治大唱赞歌，造成族群分裂、台湾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极度混乱。新一代的台湾人在遵纪守法方面，不仅没有比蒋介石、蒋经国统治时期更加进步，甚至是已经大大倒退（“立法院”内堂堂“议员”竟然打架斗殴，国民党马英九当局“黑箱作业”强硬推行“服务贸易”协定、少数外省人权贵垄断海峡两岸经济交往的和平红利而台湾本土人士生活质量更加恶化，终于导致“太阳花”学生运动占领公共机关成为国际笑柄。国民党马英九当局不能反思自身问题，公然宣布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关上了通过和平谈判达到“终极统一”的大门，还妄图在中国香港推行“太阳伞革命”，造成香港商人数千亿港元（折合数百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损失，引起天怨人怒，终于导致中国政府改变最近10年来在台湾地方选举中扶植国民党、打击民主进步党的政策，并且对国民党马英九当

局的“反共抗中乱港拒统”政策大加讨伐，造成占台湾人口多数的本土族群选民放心大胆地倒向绿营，国民党遭受惨败，“百年老店”终于走向在台湾自生自灭的不归之路，实属损人害己，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愚昧至极）。以上不幸的事实证明没有道德品质的约束，没有法律制度的制约，“民主”也罢、“自由”也罢、“政党轮替”也罢，都不可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中国台湾在学术腐败方面比起大陆来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涉及到国民党马英九执政当局的高层主管官员。美国《侨报》2014年7月12日B12版《学术丑闻！60篇假论文被撤》一文引用台湾地区和英美两国媒体报道，台湾“教授伪造人头自审论文，遭国际期刊撤稿”，“60篇发表在国际重量级期刊上的台湾学术论文因涉嫌造假被一次性撤下”，“被美、英媒体大幅报道为‘实属罕见，但在意料之中’”，其中台湾当局“教育部长”挂名五篇。值得注意的是，60篇假论文中竟然有40篇是由“科技部”赞助的；此事让中国台湾科技学术界声誉扫地，是国民党马英九当局“执政”后最大丑闻之一。我本人亲自接触过的来自台湾的硕士留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是非常低劣的、不靠谱的“中国式英语”，懂得中文的人可以看懂，不懂中文的美国人读了就笑话百出，同近期中国大陆自费留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差无几。事实上，由于台湾当局和民间企业对教育的投资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台湾人才培养已经出现危机。美国《世界日报》2014年8月13日A8版《人才荒“清大”也找不到师资》一文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所长李定国在论坛《科技发展的长远政策》中提到台湾“现在越来越少学生愿意念博士，学术界缺人才危机非常严重”，“台湾科技发展面临两大危机，一是社会不理解科学研究需要长远时间，所以有错误期待，二是台湾越来越少人才，学界人才流失问题大”，台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彭宗平表示“师资缺口越来越大，连清大材料所要找老师都找不到。”有关台湾人才流失，美国《台湾日报》2014年5月9日A3版题为《促使台湾经济转型绿营责无旁贷》的社论指出，台湾已经不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了，台湾“多年来，产品代工是台湾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更有甚者，目前一些农产品、渔业产品竟然需要中国政府提供“统战政策优惠”式的“政治订单”才有出路，台湾“研发投入不够，及工资停滞造成人才外流”，46.1%的年轻人希望移民境外、大专毕业生占移民境外人口60%，其中许多在中国大陆定居（70万人）。台湾经济长期以来靠为西方跨国企业加工零部件，属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在自主创新方面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进，仍然和国际主流社会差距甚远，比起中国大陆创新设计水平已经毫无优势可言。随著中国走向创新，台湾商人在中国大陆风光不再。台湾经济由于人才外流，创新乏力，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崛起和大陆企业走进台湾胆战心惊。前不久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当局企图采用黑箱作业手段通过“服务贸易”、“货物贸易”、造成许多台湾中小企业担心竞争不过大陆企业而群起反对，民主进步党支持者担心国民党乘机把大陆上的180万外省人亲戚移民到台湾充当国民党“投票部队”造成“外来政权”永久执政、台湾本土人士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的局面而作出过激的反应。前领导人李登辉甚至认为，如果“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都通过，“中国大陆不需要派兵就可以把台湾吞下去”（《美洲台湾日报》2014年5月9日A1版报道）。台湾学生比中国大陆学生在政治上更加不成熟、不稳定、不了解世界潮流

和全球化下世界大格局的演变趋势，前不久发生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占领“立法院”，虽然在客观上反映了台湾省大多数人民大众对于国民党马英九当局倒行逆施造成贫富悬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顶心”等黑心企业有毒食品泛滥等问题的极度不满，为台湾人民摆脱国民党贪腐政权、解体“中华民国外来政权”，争取本土人民地方自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太阳花”学生运动领袖最近公然插手同台湾现实政治经济利益毫无瓜葛的中国香港激进反政府分子“占领中环”非法集会等社会动乱，则说明在整体的层面上，中国台湾的青年学生群体在政治上十分幼稚，对中国历史极端无知，并且视野极端狭隘。了解香港历史的人都知道，香港人口中至少 50% 是“中华民国”战乱时期流亡人士的后代，其中怀念大清和北洋政府、仇视国民党者不乏其人；另外大约 10% 是亲中国政府的左派人士，其余的大概就是英国管治时期的精英人士（或“港英余荫”）。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亡香港的亲国民党人士最早占香港总人口约 30%，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如今已经下降到 10% 至 20% 左右，其中继续效忠“中华民国”、“反共抗中”的国民党“忠贞人士”在董建华管治时期尚有 50 万之多，目前已经下降到不足 20 万人（占香港 723 万总人口的 3%）。而“占领中环”的人士中有国民党流亡者家庭背景者比比皆是。由于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的考虑，绝大多数香港人是不可能支持国民党势力在香港政治中起主导作用的；他们宁可接受现状。因此，“占领中环”是注定要失败的。台湾的青年学生搞起“太阳花”运动向国民党造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占总人口 2300 万的 2000 万本土人士，以及 300 万“外省人”当中的一部分底层人士），在香港，由极少数国民党残余势力主导的、并且得到台湾马英九当局公开支持的“占领中环”动乱所面对的，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由各种虽然意识形态各异、但是都对国民党怀有历史怨恨的政治势力（包括满清和北洋政府支持者后代、亲中国的左派人士、亲英派中的部分人士，加起来占绝大多数）。因此，“占领中环”的社会基础十分狭小。国民党这次不仅在台湾“九和一”选举中遭受“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式的惨败，“中华民国”从此气数已尽，在香港，国民党“百年老店”豪赌式的“占领中环”也必然导致国民党残余势力在香港人心丧尽，被彻底边缘化只是时间问题。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近期中国大陆留学生和中国台湾本地学生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人性和伦理上的成熟水平，均有待于根本的提高。否则，就目前中国大陆在海外留学生整体而言，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否能够成为带领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领军型”高端人才，本人敢于断言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群在父母亲的财富的甜水里泡大的、来美国靠金钱混到几张“名牌大学”文凭、半桶水淌得很、被娇生惯养宠坏了的“独生子女”构成的小皇帝、小公主们“海归”回中国后，如果没有堕落成为危害中国社会稳定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或“民主运动”、“颜色革命”急先锋，兴风作浪，使中国重新陷入“民国”式的军阀混战、领土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社会动乱，我们就应当感谢耶和华中上帝恩典、感谢文殊菩萨大慈大悲、感谢大清列祖列宗在天英灵加持护佑了！事实上，100 年前大清君主立宪的和平改良功亏一篑、暴发“辛亥革命”导致军阀混战、领土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 38 年血腥战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少数食洋不化的、留学日本、同妄图侵占中国东北黑龙江沿岸三省的“黑龙会”和军部关系密切、被“反清复明、驱逐鞑虏”的种族主

义“革命”宣传洗脑的“海归”政治极端分子、军事冒险分子、大汉族狭隘民族主义分裂分子把不适合当时中国各民族人民实际需要的外国的“共和制”、“联邦制”、“多党制”、“民族主义”政治观念引进中国、慷慨激昂而不切实际、夸夸其谈而于事无补、造反起家而祸国殃民，造成“水土不服”的结果。至于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的“精英”人物，他们占领台湾“立法院”和插手香港反政府活动的过激主义行为，在对台湾现存体制和国际形象的伤害方面，已经可以同中国大陆历史上发生过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争高低；他们对于台湾马英九当局提出的诉求固然有合情合理的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广大中下层人民大众的合理要求，手段仍属于过激而使台湾的经济严重受损；至于他们插手香港反政府活动，破坏海峡两岸人民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破坏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治格局的均衡与稳定，给中国、美国 and 英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添乱，危害国际合作反对恐怖主义事业，则只能说明他们对于中国近百年来国民党同非国民党的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清政府、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反对派）之间的内战、“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真相、前苏联策划的外蒙古独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真相，以及中英两国、中美两国、中日两国之间近代关系史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演变过程的极端无知、以及对于当前和未来全球化条件下专业人才应当具备的国际视野和长期战略思维能力的极其贫乏。

早期公费留学生的特点：这批人的成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的是中国政府发放的资金。他们留学过程中不存在绝大多数自费留学生所遇到的经济困难问题，因而绝大多数顺利成才并且受到美国主流社会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欢迎。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回到中国并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剩下的多数是因为个人经济利益而没有按照规定回国服务（说穿了，就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其中大多数人通过正常程序（专业移民）取得美国身份。当然，有少部分人因为认同台湾政治体制而死心塌地地对抗中国政府，通过“政治庇护”名义居留海外。他们当中部分人确实属于高端人才（大体数字可能在1万人以下），剩下的在海外过普通人的生活（许多人已经学非所用，武功全废，或已退休）。本人认为，这些人占用了中国留学资源却一去不归，甚至做出对中国国际形象不利的事情，固然在道义上、经济上（甚至可能在法律上、政治上）对中国政府与人民有所亏欠，但是，鉴于1911年10月10日中国发生武昌暴动导致大清国政府统治结束、至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华民国”长达38年的血腥战乱期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66年至1968年“文革”动乱，近三十年来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的腐败风气到处蔓延，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海外华人社区当中的反共抗中派别）乘机制造反对中国政府宣传的影响，已经极端严重地破坏了大清康乾雍盛世以来形成的中华各民族人民传统道德和对中华祖国的认同，对他们过多地做道义上的责备是无济于事的。新中国国父毛泽东先生在叛将林彪不告而别投靠前苏联时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此话或许可以成为制定对待这批人的政策的参考。尽管如此，本人建议，对于其中的个别高端人才可以采取灵活措施，在道义上、法律上、政治上不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经济上仍然应当请他们尽力而为回馈中国，才能算作公平合理），并且用高工资、高福

利、高待遇争取他们为中国做贡献。这样做或许可以行得通。本人提出此条建议实属无可奈何之举，请见谅。

有关吸引海外中高端人才的全局性战略方针的一般建议

遥想 30 多年前，邓小平先生通过实行政治上“稳定压倒一切”、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开明的务实政策，消除了中国政府体制内可能存在的对改革开放的阻力，才有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为了帮助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为“创新型经济”，由中国官方采取特殊政策并且制定特殊法规，促成私人企业的富豪们与时俱进、学习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瑞典等西方先进国家资产阶级当中的开明、慈善、民主、进步人士的榜样，通过自觉捐款成立基金会、或认购有奖彩票等体面的方式，共同拿出按照国际主流社会招聘创新人才的标准完全合情合理、按照中国和海外华人富豪目前经济实力完全承担得起的经费，“让海外中高端人才先过上符合国际标准的体面生活”，请他们到中国发挥专长，或者做得更加干脆、更加大方一些，鉴于西方国家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环境污染问题不甚严重、食品安全基本上有保障，他们已经习惯了西方国家的生活环境，并且从专业到社会生活的各种人际关系都已经完全融入西方白人主流社会、甚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同传统华人社会脱节，回到中国创业反而水土不服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就采取适合他们特点的灵活政策，鼓励或支持他们在海外设立创新性产品开发设计公司或配套研究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或民营企业方面不仅可以不花分文，甚至可以充当中介收取“介绍费”或“服务代管费”；在某些情况下上述基金会或许应当提供贷款率先投资于他们在海外创业所需要的创新实验设备等）。这样做，可以避免他们回国创业可能带来的各种生活上不便的、政治上敏感的、文化上可能有冲突的、或其他方面的消极的因素，充分利用他们具备特殊的全球化视野和创新开发技能、身处国际主流社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积极因素，让他们有效地同中国国内企业和海外华人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以换取中国和海外华人经济尽快由廉价劳动力模式向创新设计模式平稳转型，为消除贫富悬殊（引发社会动乱和制造“族群分裂”的最危险根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可持续增长的物质财富，无论对于中国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对于海外华人社区的和谐共荣，还是对于占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人口 1% 的富豪们个人及其家族世代代长久富贵的根本切身利益，都将是十分明智而划算的、有远见的、必不可少的投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正是这样做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的创新研发部门往往设立在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际主流社会先进国家，并且按照国际主流社会合理薪资标准大量雇用非日本人、非韩国人的当地人士，以保证它们的创新型产品在功能和外观等各方面同国际主流社会完全接轨。近年来有少数中国成功企业也开始这样做了，并且在产品打入国际主流社会方面大有斩获。因此，本人认为，这是吸引海外中高端人才的上上之策，愿意借此机会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的政界领袖和富豪级企业家们分享信息。

如上所述，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目前推行的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北京市“海聚工程”、江苏省

“双创计划”等，正在朝著以务实的政策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正确方向进步。尽管如此，许多吸引人才计划都有著只想挖走已经在美欧先进国家完全成功的“顶尖人物”，对于正在走向成功、但是具有极大潜力的优秀人才不屑一顾的倾向，美国《侨报》2014年12月8日A2版题为《吸引人才回国不应只盯著顶尖人物》的文章，也证实了此类问题的存在。事实上，这种只想挖走“顶尖人物”、“空手套白狼”、花费少量资金就顺手牵羊地拿到其它国家花费巨额资金获得的现成研究成果的机会主义的、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做法（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策已经引起美欧先进国家反间谍部门的严重关注，在对于正在走向成功、但是具有极大潜力的优秀人才群体中引起不满和不安（甚至恐惧心理）。最近一两年来，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先进国家反间谍部门连续破获多起罪证确凿的中国企业工业间谍案件，大肆发布消息，海外、尤其是美国华人社会中某些“反共抗中”的极右派媒体借机攻击中国政府“偷窃西方技术”，造成极端不良的政治影响，使得上述政策具有极大的政治敏感性，因而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不符合中国吸引优秀人才为企业服务的长远战略利益的。今后必须进行全面调整，以便同国际主流社会通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正常实践接轨。本人认为，以中国富豪企业家在美国一日豪赌10多万美元，一出手用现款收购好几栋豪华住宅的“富可敌国”的“土豪气概”，加上中国政府巨大的财政能力，完全可以采取如下政策：

（1）不再把眼光仅仅盯住一小撮“顶尖人物”，就可以使上述政治上具有极大的敏感性的问题消失于无形之中，使中国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合法性”让西方国家朝野各界所接受。

（2）把吸引海外人才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正在走向成功、但是具有极大潜力的优秀人才群体（这类人士事实上也是“顶尖人才”，仅仅因为西方国家人才过剩、“僧多粥少”而没有机会成为完全成功的“顶尖人物”）。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动员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侨报》等高端媒体，对这一群体当中愿意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服务的人士进行大规模的采访报道，或者允许他们在官方媒体上做广告，或者帮助他们同中国境内的富豪级企业家、以及已经移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富豪级企业家在境外建立业务联系，国家可以基本上不花分文，充当海外优秀人才群体同中国富豪级企业家之间的中介机构并且向富豪级企业家征收合理的介绍费，或者仅仅花费少量赞助费，就可以依靠国家政权本身巨大的影响力，以身作则，动员富豪阶层投资于创新性科学研究或产品设计开发、打入国际主流社会的事业。这样做，就可以建立一个由“政界精英”（即掌握企业资讯的工商管理部门、教育部门、人事部门主管官员）、“财富精英”（即富可敌国的富豪阶层高档人士）、和“智慧精英”（即海外优秀人才群体）之间的“三方战略同盟”或“创新开发统一战线”，带领中国经济由低端加工向高端创新进行“软着陆”式的战略转型。

（3）在优秀人才群体的个人报酬及创新研发活动所需的设备投资方面同西方先进国家完全接轨。有关各类人才个人报酬的标准在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公开网站上都可以找到。目前中国各类引进人才计划的总的倾向是个人报酬太低、对创新研发活动所需的设备投资的支助数额偏低，同中国富豪级企业家和政府财力完全不成比例。美国《侨报》2014年12

月8日 A2版以《留学生回国就业 80%月薪不到1万（人民币，相当于1700美元）》报道说，“包括博士、硕士在内的所有回国留学生中，有8成人员月薪在1万元以下”，“国企、外企是最受青睐的就业机构类型，其次是民企、高校和研究机构”。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沿海城市生活费用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物价最高的地区洛杉矶的水平，而环境污染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任何一个城市。而在美国洛杉矶地区，月薪1700美元只能过清贫生活。2014年7月1日起按照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美元，因此，按照每周40小时、每月4周算，每个月最低工资是1600美元。尽管最近十年来中国留学生总体素质并不高，许多人属于“镀金”人士，但是如此微薄的月薪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因此只要能够留在西方国家，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不可能选择回中国服务。这是完全合乎人性的。唯物主义道理千头万绪，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物质刺激！离开了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任何慷慨激昂的“爱国爱乡”的宣传只能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侨报》同日同版标题为《美抢人才中国留学赤字亟需扭转》的报道中提到“新加坡政府规定，只需签订毕业后留下来工作数年的服务协议，公立政府学院录取的国际学生就可以享受政府助学金资助”。本人认为，新加坡政府这一开明进步政策，体现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且是十分务实的，值得中国政府和富豪级企业家们参考、借鉴。中国目前完全有能力在财政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自力更生地开发自己拥有合法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产品与设备。现在是下大决心做出战略决策的时候了！

有关吸引海外中高端人才所需经费的一般建议

中国至今为止在引进海外高端创新人才的报酬与待遇方面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某些地区出价太低而无法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某些地区走到另一个极端，允许超乎合理限度的漫天要价（比如我曾经听说，在美国价值100万美元的设计项目到了中国，只要走对“门路”竟然可以卖500万美元！而在美国最多只能卖200万美元）。此二种现象均有失公平。本人建议中国大陆的富豪级企业家们，在引进海外人才时，不妨到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http://www.bls.gov/oes/current/oes_nat.htm)，网址：http://www.bls.gov/oes/current/oes_nat.htm）有关各类人才薪酬的网页上查看，就可以了解各类海外人才按照国际主流社会标准应当获得的合理报酬的一般数额，并且根据企业自身条件作出合理调整，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标准。不这样做，就有可能产生“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近年来招聘海外科学、技术、工程、设计人才方面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1）对人才工作经历和成就的指望过高（动不动要求“在跨国公司、著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主持过大型项目”；条件比国际主流社会招聘人才的实践高了许多。所寻求的实属凤毛麟角；似乎整个国际主流社会都由华人在当家了，其实大谬不然。某一位美国主流社会企业人事主管官员曾经告诉我，因为职位数额有限，僧多粥少，同样具备招聘条件的高层次人才中，大概每十人只有一人得到领导层职位，其他人只能低就甚至待业。中国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排除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帮助中国企业走进国际主流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造成某些人为了符合招聘条件而伪造工作经历，例如美

国《侨报》曾经报道过的厦门大学某位女“海归”傅瑾教授，本来凭借实际经历，采用美国的宽松务实标准，在中国同类大学谋取教授职位应当没有问题，为中国大学的进步作出贡献也是可以胜任的，但是为了达到“人才引进”的目的，竟然伪造更多的经历，被人揭穿，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结局，而该“重点大学”引进人才时制定的过高要求在本人看来完全不靠谱、不合理，事实上是造成这一个学术腐败事件的最直接的根源。（2）对引进海外人才的报酬标准同国际主流社会的一般做法完全不靠谱、无法接轨（或者过高、或者过低、或者在做法上、说辞上莫名其妙。比如说，最近美国《侨报》2014年8月18日转载山东省烟台丛晓波先生题为《“千人计划”的专家长期缺岗理应劝退》一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2014/0816/430855.html>），指出某些入选“专家”“学术造假、两头挂职”，迟迟未能上岗，“名义上在中国6个月，其实大部分时间还在海外”，名义上挂著“国家特聘专家”头衔，理应清退。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千人计划”的许多具体做法同国际主流社会招聘人才的正常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很明显的。丛晓波先生文章中说：“众所周知，能进入千人计划名单的海外专家，在行业内都具有较高权威，也是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政府通过求贤若渴的诚意，宽松舒适的环境，优越高昂的待遇，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热情和动力，也是一种加快发展的捷径。而在具体运作之中，政府也确实拿出了视如珍宝的态度和举措。比如说，引进人才选择在国内任一城市落户，中央财政给予引进人才每人人民币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配偶由用人单位妥善安排工作或发放生活补贴，子女就学可按本人意愿，由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等等”。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可以提供如下意见供参考：

（1）如果让我扮演一个“假洋鬼子”的角色，为美国制定一个美国式的“千人计划”，到中国招聘美国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工程、创新设计人才（或者“明火执仗”，说得更加干脆一些，“帮助美国霸权主义者挖走中国现有的高端人才充当汉奸”），我只能按照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和生活费用较高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劳工管理部门所收集、分析、并且对社会公布的相关人才的每年或每小时最低工资、最高工资、平均工资的数据，做出合理的调整，制定合理的每年或每小时薪酬标准，吸引中国人才为美国服务“充当汉奸”（比如说，美国目前大学教授最低每年工资5万美元，最高每年工资一般在10万美元左右，另外每年由教育部门支付大约1万美元到2万美元的福利，除此之外，专业培训等开支实报实销。教授级人才为企业提供咨询等专业服务最低报酬每小时60美元左右，每次至少按3个小时计算；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300美元，每次至少按1个小时计算，所需费用还得实报实销）。但是，除了合理的各项个人费用（如旅行、搬家费），一般来说，不会有“一次性补助”的。“补助”一说，带有“恩赐”的意味（就是说，你不应当拿高工资，是我白白送给你的）。“科研补助”的说法更加荒唐无稽、同国际主流社会的开明进步实践完全不靠谱。在现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一般说来，“科研”经费完全是政府或企业应当支付的费用，不存在“补助”科研人员的问题。用“补助”一词，等于假设科研人员应当自掏腰包从事研究，而不是由政府通过税收支持和企业家赞助的责任或义务。在现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欧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工程、创新设计人才作为工人阶级精英部分的白领阶层，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甚至还要加上利润分享）的权益并且全心全

意、克尽职守地为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服务，政界领袖和企业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通过税收或先期投资全力以赴地保障创新开发工作的顺利进行，承担失败的风险，并且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大部分荣誉和经济利益。这就是西方国家现代企业创新开发文化中，企业家阶级、工人阶级、和调和双方关系的现代政界领袖阶级三者之间实行阶级合作、劳资两利、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平等的理念。使用“科研补助”的说法，就会混淆阶级关系，破坏了上述权利义务的合理界定，并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规定。这种违宪的提法必须得到纠正。

(2) 马克思、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宣布“工人没有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强力主导下，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机构，又造成了“资本没有国界”的“全球化”局面。这就彻底地打破了千百年来全世界各国、各种族、各民族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赖以长久生存发展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使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逐步地摆脱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渐进式地、但是无法逆转地简化为经济层面上的有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经济层面的阶级矛盾，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以及美英两国大资产阶级中的开明进步势力为了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动推行“马歇尔计划”、非殖民化、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等改良措施，基本上已经大大缓和而成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就为美英两国领导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击败前苏联打著“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旗号、到处侵略扩张的图谋，重新掌握人类世界社会进步进程的主导权、用政治渗透和军事干预的手段在传统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东国家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颜色革命”和“反恐战争”，彻底铲除前苏联“邪恶帝国”在中东地区扶植的代理人政权，在全世界范围内粉碎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以阿拉伯和北非地区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以英美跨国财团、跨国企业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暴烈反抗，为“全球化革命”和未来的大一统人类世界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近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失败正是反全球化、反后工业化社会的“传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利益的考量面前失败的例证。在目前的国际上，资本多由先进国家流向落后国家（有利于企业家利用廉价劳动力赚取高额利润），而人才流通的基本规律是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有利于作为工人阶级白领阶层的各类人才获得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改善自身生活、提升业务水平）。“炎黄子孙报效祖国”的因素，在这里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真正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有个人报酬、科研环境、和人际关系三项。事实上，美国政府基本上从来不对美国人才提出“报效祖国”的口号，自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由马丁·路德·金等左派领袖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以来，主流社会中基本上也不再提起“盎格鲁·萨克逊子孙”或“白种人子孙”的概念，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才来自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种族，提这类口号反而造成种族关系紧张，并且吓跑希望来美国发展的各国人才。事实上，在任何多民族的国家鼓吹民族观念，都弊多利少，不提民族观念，反而社会更加和谐。比如说，大清太祖高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创建了中国、

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元文化、民族平等的后金帝国后，推行满蒙联姻政策，弘扬满汉一家、各族一体理念，积极鼓励遭受明朝血腥恐怖政权残酷剥削压迫的汉族农民从关内移民到后金帝国解放区，靠的是“计丁授田”和“恤贫训农”的民本主义的进步政策，而不是向汉族农民宣传女真文明的伟大，或者“女真子孙血溶于水”的“民族大义”。皇太极做得更加干脆，索性废除了女真、蒙古、汉人之间的界限，改称大清固伦（“大清”一词甚至不是女真语词汇，而是蒙古语“先锋”、“先进者”、“善战者”的音译。“固伦”是女真语“国家”或“民族”的意思。合并起来就是“先进国家”或“先锋民族”的意思）。大清八旗入关，历届皇帝和满洲贵族竭力消除民族观念弘扬“天下”观念，领导 50 多个民族建设辽阔中华一统江山长达 300 年之久，其中长达 150 多年的康乾雍盛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举世闻名，除了极少数反动会道门鼓吹“反清复明”却因为得不到广大汉族劳动人民的支持而失败，西藏、新疆、外蒙古平安无事，从来没有听说过“独立”要求。大陆时期的国民党鼓吹并推行大汉族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广东、大江浙地方主义，在各民族人民之间、甚至是汉族的不同方言族群之间制造矛盾，结果引发外蒙古独立，新疆在前苏联策划下出现民族分裂性质的暴动，西藏、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地区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国民党统治中国只有 22 年（1927 年到 1949 年），不到大清统治时间的十分之一（所谓“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同样道理，新加坡独立后，在李光耀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占人口 75% 的华人主动清除“大中国沙文主义”和“大汉族狭隘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采用英语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官方语言（英语是“国际普通话”），清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广东话、闽南话方言隔阂，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华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话”在新加坡的官方名称），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简体汉字，国内各民族、各汉族方言族群之间一团和气，共存共荣，对于成功地建设温和无害的、改良型的、非苏联模式的、对世界现有格局的稳定不构成威胁的、“非暴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和谐社会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同时使新加坡这个袖珍国家同周边国家关系长期融洽，并且得到国际主流社会先进国家的高度尊重。其中推行“普通话”和简体汉字，是值得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社区有识之士学习借鉴的（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已经十多年，至今没有推广普通话和简体汉字，已经引起许多海外华人质疑，说是“中国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中国和新加坡是两国一制”。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推行汉语拼音、提倡“识繁用简”，虽然有所进步，比起新加坡的务实做法还有差距）。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积极消除民族和族群隔阂、促进华人传统文化和以盎格鲁·撒克逊·凯尔特文明为主导的国际主流社会文明的所有积极进步因素的互相融合，同时大力消除和抵制两方面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值得借鉴。由此可见，顺应世界全球化潮流，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进步实践接轨，促进民族融和，弘扬“天下”观念，才是让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人类世界各国所接受的最佳选择。吸引海外人才为中国企业服务，也是同样道理，主要依靠的只能是合理的个人经济利益、加上优良的科研条件、和融洽的人际关系，而这些条件应当尽快同国际主流社会接轨。

（3）在国际主流社会里，“两头挂职”长期不上岗的、“名义上在中国 6 个月，其实大部分时间还在海外”的“国家特聘专家”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类“权威专家”可以提供短期咨询或

其他专业服务，或者通过国际互联网视频软件开设网上课程，并且按照行业中普遍接受的标准收取一定数额的合理报酬，但是基本上不可能获得“国家特聘专家”地位。得到“国家特聘专家”职称的一般说来，只能是全职工作的专家，工资收入很高，并且可以分享研究项目商业化后的利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不得在受雇机构之外兼职，更不许可在不同国家之间兼职。事实上，千人计划招聘的“国家特聘专家”中个别人士长期“不上岗”是十分正常的。这是因为，其中许多人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里属于行业里的精英，西方国家有关机构为了保障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安全，并不鼓励、甚至忌讳他们在中国兼职；而这些人士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只好把中国提供的机会割舍了（或者说，出于所谓的“民族大义”，勉强接受中国“国家特聘专家”地位，但是三心二意不肯卖力）。在美国，虽然相当大的一部分科学研究项目的成果是可以对社会公布、并且可以让中国和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敌对国家（如伊朗、朝鲜等）有关方面免费分享，雇佣的教授或科研人才可以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端人才，根本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间谍活动”的嫌疑，但是，美国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所高薪雇佣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士，如果同时在中国（或美国其它院校）兼职，事实上是有可能影响他们在高薪雇佣他们的美国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工作效率、产生伦理道德方面的严重问题，并且引起美国人民大众对中国政府不满、损害美中两国友谊和两国学术交流的正常发展的。所以说，这种做法是短视的、弊多利少的，不符合中国或海外人才长久利益的。因此，我认为，

（1）今后“千人计划”应当以雇佣全职专家为主，可以引进到中国大专院校、研究机构、或大型企业，也可以让他们在美国居住并从事研究工作，但是必须全职为中国方面工作。这样做，“不上岗”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近几年来中国引进人才似乎以“挖角”为主，就是说，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把极少数在美国已经完全成功的、担任高端职务的人才拉回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具有一定潜力但是尚未完全成功、有能力担任高端领导职务但是由于“僧多粥少”等客观原因只担任过一般职务的人士，基本上是不屑一顾的。某些海外华人批评这样的做法是“要人才手中的现货、不要人才本身”，更加尖酸刻薄的人士甚至指责中国政府和企业“自己不肯花钱培养人才，在人才成长的艰难困苦的过程中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等到人家成功了就凑过来搞政治宣传，跟国民党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从峨眉山跑下来，闯进中原找毛泽东摘桃子，实在没有两样。只会跑到美国抢人才，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跑，免费搭车，竭泽而渔”。这种说法固然有同中国政府分庭抗礼、有失“民族大义”、甚至是反共抗中的过激主义的嫌疑或倾向，但是严格地说来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事实上，就整体而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教育和科研上花费的开支实在太低，同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在太不相配。民营企业家中许多人热衷于在电影女明星当中包二奶、或者跑到美国赌城豪赌、或者大搞政治腐败，但是在有关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捐献也是很少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今后可以考虑鼓励富豪级民营企业家（或者 500 强民营企业制造业）捐款成立各种基金会，赞助各种科研项目，给具有一定潜力的人士一些机会。这样做，在引进人才的政策上就同国际主流社会的正常实践接轨了。

本人去年参加过中国北方某重点城市组织人事部门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人才招聘会，认真地研究了会上散发的《人才需求信息》后，发现上述问题是存在的。例如，某大学所要招

聘教师的“提供待遇”为年薪 8-10 万元（人民币），提供科研启动费 3-5 万元（人民币），安家费 2-5 万元（人民币）和购房补贴 10-20 万元（人民币），本人认为，此种待遇对于大多数文科岗位（如第 7 号“心理学”、第 1 号“财政税收”、第 34 号“市政”等）而言是切实可行的，因为这类人才在美国严重过剩，中国（包括台湾）留学人才基本上无法染指。至于工程技术类岗位（如第 49 号“材料科学与工程”、第 22 号“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等），则另当别论，因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类人才在美国严重短缺（缺口为 25% 左右）；年薪在 6 万美元至 9 万美元（约合 36 万人民币至 54 万人民币）之间波动；除此之外，配备实验设备至少每人需要 3 万美元（约合 18 万人民币）以上（电脑及配件另计）。以上报酬标准是参考如下数据而定的：（1）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2）美国民间组织“工程师工资信息网”。按照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两年制社区学院（Junior College）工程技术类全职教授的年平均工资为 78070 美元（一般要求拥有硕士学位。每年工作 10 个月。如果暑假授课则要另外加工资）。四年制大学（一般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及数年相关工作经验）工程技术类全职教师的年平均工资为 99600 美元。美国工程师紧缺，本国大学毕业生仅够满足本国需要的 75%，另外 25% 招聘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印度、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少量来自中国。工程专业在美国需要四门微积分及三门至四门以微积分为基础的物理课，本国学生望而生畏，每年本国毕业生人数在 8 万人以下。美国民间组织“工程师工资信息网”（engineersalary.com）上列举的最新的美国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平均起点工资为：本科毕业生每年 59180 美元，硕士毕业生每年 66720 美元，博士毕业生每年 85640 美元。讯息网址：

<http://www.engineersalary.com/Mechanical-Engineer-Salary.asp>。因此，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用年薪 8-10 万元（人民币）（约合 1 万 3 千美元到 1 万 6 千美元），吸引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海归”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目前基本生活费用同美国一样高，甚至更高；而在美国，每年个人所得在 1 万 4 千美元以下就被定为“贫困户”，政府每个月发给 200 美元“食品券”购买食物（相当于下等中产阶级水平的食品费用，购买能力相当于中国“文革”期间定量供应政策下一般人民营养食品的两倍左右）。除此之外，“购房补贴”不仅太少，无法购买符合大学教授身份的体面的住房，“补贴”的说法带有“恩赐”的色彩，容易被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才误认为贬低身价把人才看成“廉价劳动力”或“商品”。大家应当知道，在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欧美“福利国家”，工程技术人才的待遇，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资产阶级开明派人士，经过几十年的工人运动，所得到的民主进步的成果，也是欧美“福利国家”资产阶级开明派人士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与时俱进，尊重工程技术人员所付出的脑力劳动的合理市场价值的表现，因此，是工程技术人才根据自身的贡献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而不应当被看成是“恩赐”或“补贴”）。当今的西方国家无论公共机构或私营企业，都发放合情合理的工资，而不用“购房补贴”的说法。一般来说，只有出差时有“餐费补贴”、“旅馆报销”的名目。在类似文化与精神层面的问题上，最好能够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进步实践接轨。

“包养”海外中高层次创新设计开发专业人士所需费用

如果按照美国中高层次专业人士每年平均薪资与福利标准（每年每人大约 10 万美元），则 5 万领军人才每年需要 50 亿美元。如果每年平均为每人提供 5 万美元经费购买国际上最先进的科研设备等，则 5 万领军人才每年需要 25 亿美元。这两项相加每年开支大约需要 75 亿美元；如果每年平均为每人配备 1 个 10 人的团队（全部使用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每人每年薪资加福利 10 万元人民币（大约 17000 美元），则 5 万领军人才每年配备团队的总人数为 50 万人，每年薪资总额为 85 亿美元。如果再追加 10 亿美元为特别费用（考察、培训、特殊用途），以上所有数额相加总数为每年 170 亿美元。上述 170 亿美元中，25 亿美元购买国际上最先进的科研设备；5 万领军人才每年报酬需要 50 亿美元，其中将近一半用于在中国生活费用（25 亿美元），另外一半在海外生活（25 亿美元），所以实际需求外汇数额为 25 亿美元左右。以上两项相加总额为每年 50 亿美元，占中国目前每年平均外汇收入（每年大约在 600 亿美元左右波动）10%。本人认为，这一数字是目前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承受的。事实上，根据《侨报》某些信息，中国目前外汇过多甚至不知道应当用于何处，如果拿出一部分在欧美就地建立创新设计研究中心，就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有效转型。另外，中国许多城市住房建设过剩，国家可以按照原来造价另加 15% 利润收购，开设社区学院或创新研究机构，使各方面皆大欢喜。

有关吸引海外人才为北方省区服务的特殊建议

有一位来自河南省的美国华人同胞告诉我说，中国北方省市近代历史上移民海外较少，因此在对外开放方面缺乏助力。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一缺憾反而有助于我们突破最近 3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占统治地位的江浙模式和广东模式，以务实理性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开拓出一条适应北方或中原地区人民需要的、并且比江浙模式和广东模式更加合理和谐的、能够产生更大经济效益、并且避免环境污染等各类严重问题的新模式。事实上，从目前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形势来看，腐败官员如周永康，黑社会老大兼奸商刘汉等，大都出身并发迹在南方省份，尤其是四川、湖北、广东、江苏、浙江等南方省份。这些省份在解放前是内战内乱的重灾区，许多不法奸商掠夺的社会财富大多数转移到境外，并且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洗白了”成为有体面的华人资金，他们的后代成了要缠万贯的体面商人。因此吸引境外华人前来投资设厂，实行江浙模式和广东模式，就有现实条件。但是由于少数前来投资设厂的海外华人商家发迹于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难免把一整套男盗女娼、官商勾结的腐败习气带回来，严重腐蚀中国社会道德、违犯法令侵犯工人利益，引进高污染企业，不遵守安全生产法规，造成许多严重问题。极少数来自海外华人社会的商人的最为严重的劣根性当中，除了不原意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进步实践接轨外，就是“柿子捡软的吃”，“空手套白狼”，对于投资开发创新产品和技术毫无兴趣，只知道廉价购买美国人抛弃不用的陈旧技术和设备，只会利用剥削中国大陆和越南的廉价劳动力、为跨国企业生产零部件大发横财（越南今年在中越领海争端期间，许多城市市民借机报复，打砸抢烧台湾商人开设的商店和工厂，就是极少数台商商业道德无法同国际主流社会良好标准接轨，引起仇恨自酿恶果）。台湾某家网络媒体文章指出，他们只能在代工模式当中寻找利润差，牺牲劳工安全、卫生与环保。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让极少数人大赚特赚黑心钱，

害苦了海峡两岸人民大众，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激化了中国大陆贫富矛盾和台湾地区族群对立，威胁了社会稳定，破坏了中华民族赖以休养生息的自然环境，并且因为污染的后果影响到世界各国，引发国际争端，因而是无法永久持续下去的。因此许多海外学者不分左派、中间派、右派，都一致认为，以高污染、高消耗、高腐败、低工资、低效益、低福利为代价的现有江浙模式和广东模式在社会和谐、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三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应当转型。事实上，这些省份目前也正在加速转型，只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能够咸鱼翻身。

而北方各省在海外关系较少，黑社会势力影响也较小，其中大多数在抗日战争时期被中共所属的抗日军队收编改造或分化瓦解了。因此同南方省份相对而言，目前社会比较稳定。同时，北方同胞民风比较纯朴，长达 150 年之久的大清康乾雍盛世时形成的中华各民族人民传统美德保留得比较完整，中共执政的抗日军队根据地形成的新中国价值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虽然外来投资设厂所带来的利益较少，但是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也会少很多。同时必须看到，北方各省拥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只要思路正确，直接同国际主流社会开明进步势力的正常实践全面接轨，要开拓出一条有别于现有江浙模式和广东模式的创新道路，不是无法做到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正是因为同旧式的海外华人社会关系较浅，北方各省完全可以绕开这道门槛，直接同美国主流社会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或美国公民）创新性人才实行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开创一个以低污染、低消耗、低腐败、高效益、高工资、高福利为特点的、在社会和谐、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三方面都可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新的发展模式。

大家知道，日本和韩国许多大财团都在美国和欧洲设立创新设计部门，用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利润分享的文明方式吸引最高端人才（包括美国人）。有许多人认为，《侨报》所承认海外大陆博士级人才 84% 以上不回中国是很可惜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些人才不回中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他们比“海归”们更加明智，更加尊重和维护现实利益，更加接轨于国际主流社会的开明进步的实践，对于“山寨版”和“空手套白狼”等有害于创新开发事业的不良奸商作风更加不屑一顾，有更加强健的免疫力。我们正好可以与时俱进，顺水推舟，号召北方各省的富豪级企业家们把财力集中起来，在美国和欧洲产品创新开发设计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各大城市建立几个大型的创新产品研发中心（或者鼓励来自中国的创新人才就地创业，并且在他们和中国大陆本土富豪之间穿针引线，建立起海外人才、本土富豪和政府官员“三位一体”的“智慧、财富、权力”大同盟，就像当年毛泽东先生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地方实力派建立“三位一体”的抗日大同盟那样），仿效日本人的方式吸引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才甚至美国主流社会人才为中国企业服务，开创出一条比现有江浙模式和广东模式更加优越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甚至基本上不需要花钱，只要为海外人才介绍中国本土富豪客户，鼓励中国本土富豪客户在招聘人才的待遇问题上同国际主流社会接轨就可以了。

鉴于北方地区近代历史上与海外联系同南方省市相比而言较少，在引进人才时最好能够采

取“五湖四海”、“海纳百川”政策，即不分省籍地广泛吸收各种地域背景的人才。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彻底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即是江浙和两广人士垄断政权，大搞狭隘地方主义，造成其它省份的各阶层人民普遍不满。只有“五湖四海”、“海纳百川”，才能够化劣势为优势，后来居上。另外，还必须吸取台湾当局痛失大批人才，中国大陆南方地区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土木工程）和湖南大学海归博士南方圆（电气与信息工程）“非正常死亡”事件（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029/12/72265_8036065.shtml）的深刻教训。根据《侨报》2014年7月25日A3版报道，台湾最近发生复兴航空坠机事件，其中原因之一，是大陆四川航空用比台湾薪水多一倍的优惠挖走了10名经验丰富的技师。台湾当局富得流油，却利令智昏，台湾生活费用和美国一样昂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付给飞机技师的薪水竟然只有美国的一半，大陆公司把薪水提高到美国标准（同国际主流社会接轨）就轻而易举地挖走了关键人才。台湾当局为了在关键人才的报酬上省钱，造成飞行事故，死伤惨重，实属“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不智之举。根据中国新闻网（网页：<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8-25/6527372.shtml>）2014年8月25日报道，台湾当局为复兴航空坠机事件死难者赔偿金高达每人1490万台币，共死亡48人，总数高达71520万台币，折合美元2146万（1元台币大概等于3美分）。受伤10人的补偿费还不算。恶劣影响所造成的商业业务的损失是很难估计的。而10名技师倘若按照美国政府劳工部公布的平均年薪每人129,600美元（网页：http://www.bls.gov/oes/current/oes_nat.htm#53-0000，项目：Airline Pilots, Copilots, and Flight Engineers），就是129万6000美元，加上福利不会超过200万美元。台湾国民党当局这次亏本的数额竟然是节省工资的好多倍。国民党马英九当局固守“白色恐怖”时期“廉价劳动力”政策，却不愿意与时俱进，向“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的现代福利社会转型，造成如此恶果，实属咎由自取。台湾当局不肯拿出合理经费留住台湾人才，结果是大批台湾人才跑到大陆工作。台湾国民党当局至今歧视、防备来自中国大陆的国际华人人人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结果是后者宁肯在日本人的公司里做事，享受高工资、高待遇、高福利，也不肯去台湾帮助创新开发。众所周知，自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主流社会先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学历是基本上承认的。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水平一般，竟然因为“政治挂帅”的“反共抗中”的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不承认中国大陆高等院校学历，岂非怪事！至于中国大陆“海归”博士“非正常死亡”事件，许多大陆人在网站上发表过激言论，把一切不幸怪罪于政府，把目前的大学引进、使用人才体制说得一无是处，大加讨伐，但是因为本身的局限性，也无法提出真正行得通的改善方案，只是空谈误国而已。我认为，并且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认为，这些“海归”们固然拥有博士学位，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近年来，许多美国名牌大学，为了赚取高昂学费，就千方百计地适应中国大陆留学人员对于迅速拿到高学位的“特殊需要”，采取“灵活措施”（就是说，降低标准，让您过关），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否则的话，学习电气与信息工程和土木工程，只要真正学到本领，应当可以在美国找到工作，即使对中国现状不满意，也可以回到美国发展，何必“非正常死亡”呢？事实上，近年来的“海归”人士绝大多数属于无法同国际主流社会接轨者，大多数有能力在海外发展者，选择留在国外。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北方省市企业界和政界精英朋友

们高度重视，并同我们一起探讨解决方案。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自从习近平先生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大力惩办政府机构内部的腐败分子，逮捕法办了一大批“大老虎”，在整顿吏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确实是史无前例、超过了大清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执政时期惩治贪腐的力度和深度，值得将来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消除了政府内部的腐败，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另外一句话说得更加干脆，叫做“腐败的人民让腐败的政府统治是活该的”。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政府机构内部的少数贪官污吏只是冰山一角，多抓几个周永康之流就可以平民愤，而社会上民间的腐败是更加严重、更加普遍的，大大小小的刘汉团伙才是盘根错节、足以让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动乱根源。实际上，中国以及全世界华人社会最大的腐败问题是大量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私人企业富豪们在境外豪赌。中国国内博彩业研究专家表示，保守估算，中国内地每年有将近 6000 亿元人民币（1000 亿美元）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超出中国政府每年外汇收入将近一倍！并且是所谓“公款吃喝”每年 3000 亿人民币的两倍！）。中国内地专家曾建议政府垄断全面开放博彩业，所赚的利润用于教育和福利。如果能够实行，则每年 1000 亿美元（6000 亿元人民币）赌博资金，扣除中彩者得到的奖金和各项开支，还可以剩下至少 700 亿美元，足够支付所有海外人才到中国创业资金、在海外设立创新开发研究机构、为全国学生提供基本上免费的教育。在当今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特别是初中等教育，居民负担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 8%，而中国的现实却远非如此。2002 年，在教育投入总量 9248 亿元中，国家投入 3107 亿元，占 33.6%；社会投入 346 亿元，占 3.7%；个人投入 5795 亿元，占 62.7%。本人认为，由国家发行“创新研发教育彩票”，将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中国富豪们爱好赌博的陈规恶习，合符人性并顺理成章地改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资金来源，则仍然可以取得“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辩证功效。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民（包括富豪）因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并不认同豪赌行为。美国人民多数没有豪赌行为；多数豪赌客户均系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并以中国、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华人居多。美国人允许开设赌场吸引国外资金，纳税部分用于正当的社会福利事业，确实收到了“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辩证功效。中国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上某篇文（<http://www.hainan.gov.cn/data/news/2010/01/94435/>）持有类似观点。《侨报》2014 年 10 月 17 日以《大陆解禁赌马千亿境外博彩资金有望回流》为题报道说，中国富豪阶层人士每年在海外赌场消费 1000 亿美元左右（这个天文般巨大数字可以提供 500 万学生每个人一年 2 万美元奖学金，或者 200 万海外优秀人才每个人一年 5 万美元工资，或者 100 万海外优秀人才每个人一年 10 万美元工资），中国政府决定开放赛马博彩以便回收资金。这是务实的做法。如果其中部分收入投入科技创新，或许可以为中国经济转型做出贡献。